

对话

被誉为“台湾通识教育之父”的黄坤锦，近年来在很多大学都开展了讲座，中气十足、思维活跃的他，并不太像一名年近古稀的老者。

他为通识教育带来耳目一新的认知。比如，在西方备受推崇的通识教育，在我们的大学为什么沦为“水课”？大学四年如何实现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水乳交融？……

为推动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通识教育发展，黄坤锦不遗余力。

专门教育 + 通识教育 = 专业教育

《中国科学报》：您曾经在讲座中说，大陆及台湾的大学错误地理解了专业教育。您认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存在哪些理念上的误区？

黄坤锦：人类早年的大学教育就是通识教育，孔子时代、西方早期希腊罗马时代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分科之说，大学里不分院系。

最早出现的专业——医师、神父或牧师、律师，医师不只学习医术，还要学习大量动物、植物、天文的知识以及拉丁文；神父不只读圣经，还要通晓各国历史、文化，学习希腊语和拉丁文；律师也不只学法律，还要了解人类学、心理学等知识。算起来，1/3 以上的时间都在进行通识教育。

这一情形直到工业革命，随着社会需求增加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革命后，美国大面积开发西部，为了满足种植、收割、售卖的需要，大学里逐渐成立了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之后分科越来越细化，大学根据人们的志趣逐渐形成了以各院各系为代表的专门教育。

因此，这时期的大学就是专门教育和通识教育两种，由此构成了专业教育。今天我们要重新建立这一概念。只有专门，意味着还不够专业。不读通识充其量只是“匠”，读了通识才可能成为“师”。

《中国科学报》：相比于西方认知，为什么我们对通识教育的认识走入偏差？

黄坤锦：中国人对“专”——专门教育 (special education)、专业教育 (professional education) 很重视、很崇敬。但是对“通”——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却认为可有可无。

究其原因，在于中西对“general”一词的理解差异。在英语词典中，general 释义为基本的、根本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中国人的理解偏重“普通的、一般的”，西方人的理解偏重“根本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

美国大学教育尤其重视通识教育，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都会亲自讲授通识教育科目。但在我国，通识教育往往沦为“水课”。就是因为中美对 general 一词的理解之差，带来了今天很大的差异。

通识教育与专门教育怎样走向融合

《中国科学报》：除了认知偏差，您



黄坤锦

台湾交通大学、中原大学荣誉教授，台湾通识教育学会前理事长黄坤锦：

大学四年都要有通识课

■本报记者 温才妃 许悦

鼓励甚至要求全校的专业课教师，在某一段时间(例如三至五年内)在通识课程中开授一两门科目，将其专、精的专门科目开授成通识功能的科目，以惠及全校学生，行之多年，专门教育和通识教育自然会相互融合。

认为，通识教育与专门教育之间需要打通的瓶颈还有哪些？我们应该重点关注解决哪一方面？

黄坤锦：要充分了解通识教育对于专门教育的基础功能和统整功能。通识教育足以促使专门教育更广、更深，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海峡两岸的大学都应加强改进通识教育。

这就要求大学里增加通识课程的学分比例、课程类别、科目内容，改善教学。美国大学的通识学分比例，大多

占毕业总学分的 30%至 35%，中国大陆则较少，其中台湾地区约 22%，大陆地区约 20%。

在课程方面，通识教育和专门教育的课程相互融合，如在大一阶段，以通识课程的比例为多，内容以基础性、补救性为主，但仍宜上专门课程；大二、大三时，通识课程和专门课程的比例则大致相同，通识科目内容注重广博性、多元性；大四则以专门课程的比例为多，但仍宜有通识课程，通识科目

应注重统整性、进阶性。如此，使通识科目和专门科目相互交融。

学校要修订政策，鼓励甚至要求全校的专业课教师，某一段时间(例如三至五年内)在通识课程中开授一两门科目，将其专、精的专门科目开授成通识功能的科目，以惠及全校学生。行之多年，专门教育和通识教育自然会相互融合，美国大学已有此做法。

《中国科学报》：在课程设置上，通识教育还要注重解决哪些问题？

黄坤锦：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一样，中小学有主课和副课之分，且基础教育偏难，如美国的中小学数学教育比大陆和台湾晚了两年，导致学生无法均衡发展，有拔苗助长的倾向。而大学进行的是分科教育，理科学生高二、高三就告别了历史、地理；文科学生高二、高三告别了物理、化学、生物。因此，在大学里开展通识教育要注重基础性，有助于补救高中过早分流、分化的问题。

大学通识教育具有基础性、广博性、统整性的特点。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高校应根据学校自身特点，进行不同的课程安排。比如，北大、清华等一流高校的课程，基础性的课程可占 10%，广博性占 40%，统整性占 50%。但普通高校的课程则基础性占 40%至 50%，广博性占 40%，统整性占 10%至 20%。不要一味地效仿清华、北大，各校要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这三方面的比例。

专业课教师要有通识意识

《中国科学报》：总的来说，为了做好通识教育改革，大学应该做好哪些工作？

黄坤锦：改进通识教育机构，增加专职单位如通识教育中心，负责规划、协调和执行之功能，其上则由通识教育委员会负责审议和决策之功能。

加强教师的研习和培训，建立通识教育中心，每学期宜组织一至两次通识教学研习会，让全体担任通识科目和专门科目的教师分批分期参加研习，以收培训之功效。

促请学校领导主管重视，党委书记、校长、副校长以至各级主管，对通识教育的推动至关重要，因其理念认知、支持态度、资源分配、考查评核等均有重大作用。其担任通识教育委员会之委员，宜有定期之研讨。

《中国科学报》：通识教育和专门教育融合，在教师层面应树立怎样的理念？

黄坤锦：通识科目的教育目标有认知、技能、情意三大方面，教师要三方面兼顾。认知是指在学理、知识上的了解；技能是指教完之后，能在生活上运用；情意是指学生学完之后，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有提升的作用。大学通识教育，尤其要注重情意目标，教师在教学中要把自己的人生历练告知学生，引发兴趣和共鸣。

同样，专业课也要求教师在专业中融入通识。专门教育的任何一门科目，其教学功能，可分主要学习、辅助学习、附带学习，必须三者兼顾，特别是其中的附带学习与通识教育之功能最具效益，教师必须在授课中经常提及学习之内容对于人类社会有何意义和价值，其目的和功能为何，其正用、误用、滥用之可能性和结果等，大学的通识教育中心必须经常举办教师研习营会，加强了解与运用。

总之，通识教育与专门教育的融合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基于这一理念，教师的课堂授课才能完成好。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最近几年里，高校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多，2019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 830 多万人。每一年的大学生毕业季，大学生们都要面对一个扎心的事实——“史上最难就业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的就业难？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该如何解读？

毕业生需要多久才能找到工作？高学历一定会比低学历的人赚得多吗？高校的课程安排有多少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学术水平，又有多少可以为他们的就业做准备？为了找到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学生要做哪些准备？如果找到了一份普通的工作，他们如何才能在工作中脱颖而出呢？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多年前相比，当今社会各个岗位劳动者的能力与水平均明显提高，充分说明了高等教育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很多时候，人们对于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关系的认知是非常武断和片面的，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实际工作中，雇员的受教育水平往往会高于就业体系实际需要的水平，这种趋势是很明显的，即使这个职位不一定需要一个大毕业生。人们常常用“过度教育”来形容这种现象，然而，“过度教育”的背后，往往会忽略雇员在其工作过程中，对自身能力的频繁甚至创新性使用。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关注“教育向就业过渡”的过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研究将这个过渡期限定为 10 年。为了解读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开始建立有效的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机制，定期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展开调查，在此基础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网络。同国际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尚不健全，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数据非常缺乏。

而且，与国外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不同的是，很长时间以来，我国既有调查对象基本上以处于就业过程中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为主，调查内容仅涉及其毕业离校时初次就业率及其初次就业状况，既未包含岗位匹配度、晋升机会、岗位转换、职业适应、工作满意度等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未能反映出毕业生正在求职、短期内可能就业的情况、实际就业状况以及未来职业发展状况等。

总的来讲，我国尚没有较为权威的全国性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系统，无法长期跟踪监测毕业生离校后的就业与职业发展状况，难以对高校人才培养更加适应社会之需，提出切实有效和可行的思路方案。部分省市就业部门、高校力图开展毕业生就业质量跟踪调查，但统计结果碎片化、局部化，难以全面真实呈现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情况。一些社会中介机构或专业调查公司虽也开展过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但因条件、目标等多种因素限制，其结果难以做到全面、准确和客观。

好的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不应该仅仅是简单的信息描述，而应试图对毕业生就业及职业成功的原因进行解释，并从不同的维度比较分析高等教育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国际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对象皆为已毕业的大学生。大多数国家的调查对象为毕业 1 年到 3 年的大学生，如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瑞士、印尼等；也有的为毕业后 6 个月，如英国、澳大利亚。

总结起来，国际上高校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的通行做法，普遍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具有多维度统计指标体系；二是打破“时间局限性”，注重毕业生离校后的中长期跟踪调查与信息反馈；三是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高校等多元统计主体共同参与，拥有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研究网络系统。

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可以详细呈现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涯，为高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数据。在全国范围内构建由教育部就业主管部门、专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以及各高校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网络的支持下，通过对全国范围内已毕业大学生多时点、纵向性的跟踪调查，可以使教育管理部门准确把握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为国家制定各项经济政策、开展高等教育改革提供数据支持。同时，通过大数据平台的追踪调查及分析以及及时反馈社会需求，健全专业预警、退出和动态调整机制，使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相匹配，增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和职业发展能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研究院副教授)

毕业生跟踪调查是解读「供需关系」的有效手段

■包艳华

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这是个问题！

■陈洪捷

学科是大学组织的基础，学科制度是大学的核心制度之一。然而，学科制度在促进知识发展的同时，也在束缚知识的创新。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跨学科、交叉学科、超学科、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等呼声不绝于耳，传统的学科体系和学科制度也在不断地受到冲击，知识的创新往往都是打破学科边界的结果。

然而，“学科”二字在当下的大学中却地位显赫，意义非同小可。可以说，学科已上升为大学管理与发展的一个核心概念。我们常常会听到这种说法，“学科是大学的基础”或“一流的大学建立在一流的学科之上”等。

这里所说的学科，主要是指的是“一级学科”。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大学所研究和传授的知识分为 13 个学科门类，每个门类分为若干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之下又分为若干二级学科。目前的一级学科有 110 个之多，比如物理、化学、或法学、教育学。二级学科接近 400 个，比如一级学科数学之下设基础数学、计算数学等 5 个二级学科，一级学科教育学之下设有教育学原理、教学与课程论、比较教育等 10 个二级学科。

曾几何时，我们认为大学学科分化太细，学科之间各自独立分割，资源不能共享；人才培养过于专业化，学生知识面不够宽广；教师的科研方向过窄；并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度重视二级学科，忽视一级学科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提出要淡化二级学科，重视一

级学科，以一级学科为单位进行建设、管理、评估。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申请和审定，也从二级学科转向一级学科的口径。一级学科的建设和管理被赋予重要地位。

从“二级”到“一级”学科转变的标志是 2011 年，新增博士点从这一年开始一律以一级学科口径进行。同时，伴随着学科评估的逐步开展，一级学科成为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单元。之所以要“二级”转“一级”，是因为据说可以打破二级学科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倡导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可以集中多个二级学科的力量，有利于联合研究一些大型的科研课题；可以按一级学科设置课程体系，有利于培养具有广阔知识背景的人才。

那么，通过 10 多年的实践，一级学科管理模式是否实现了当初所期待的目标？或者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迈进了？具体我们可以问一问：自从实施一级学科管理以来，二级学科之间的资源是否实现了共享？相互的交叉与融合是否增加了？二级学科之间在科研方面的合作是否增加了？教师们对跨二级学科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否增加了？我们的博士生课程是否在一级学科的框架下得到了改造？我们培养博士生的知识视野是否更加开阔了？学者们研究的方向是否更加宽广了？

要回答这些问题，当然需要深入的研究。但从经验上看，我们当初对一级学科管理模式的期望很难说实现了，在多数情况下，教师们的科研和教学与此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

面，一级学科管理模式却导致了一系列新问题：

第一，按一级学科来申报一个博士点，就意味着在一个学科点上至少应当具有三个二级学科点。对于规模较大的大学和学科，满足这样的要求相对容易，但对于院校规模和学科规模较小的大学，建立能够支撑两三个二级学科的学术队伍则并非易事。其结果就是，申请单位必须在短期内迅速扩大队伍，以满足博士点的申报要求。而在短期内迅速扩大队伍的代价，往往是质量下降。

第二，按一级学科建设博士培养点，不仅提高了申请的门槛，更重要的是，一级学科的管理体制往往会弱化某一学科的特色。一所大学如果在二级学科的层次上有一个很有特色、质量很高的二级学科，但为了申请博士点的授予权，该学科必须把自己的教师队伍分配在三个或四个不同的二级学科中，这样不但不利于特色的发展，而且白白做了一些没有自己特色的研究。

第三，一级学科管理往往会影响到那些具有特色的二级学科发展。同一个一级学科之下的各个二级学科固然具有共同的归属，但往往也有相当的距离，甚至相互间还会有竞争性。一级学科管理经常无法平衡各个二级学科的诉求，会出现弱势学科压制强势学科的发展，或者强势学科抑制弱势学科的发展。比如同济大学的法学博士点以知识产权法为重点，很有影响，但由于其他二级学科较弱，因而一级学科博士点被认为不合格；再比如科技

哲学在哲学一级学科之下，往往难以获得相应的资源，很难发展。如果实行二级学科管理，则会避免这类问题。

从知识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思考以下问题：知识创新通常发生在“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的层面？学者们是在“一级学科”还是在“二级学科”层面进行学术工作？学术交流是发生在“一级学科”之间还是“二级学科”之间？研究生培养是在“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的基础上进行？教科书通常是按“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编写？大学为社会服务所依据的是“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的知识？跨学科通常发生在“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层面？

经验告诉我们，二级学科是知识活动的实质性层次，是高校教师通常教学和科研的平台、知识交流与生产的平台，同时也是适合于培养学生的知识范围，那么，我们为何要特别重视一级学科建设和评估？比如审批博士点为何要在一级学科层面上进行申报和审核？我们能否尊重知识生产和传承的现实，在二级学科的层面上建设博士点，按照二级学科的口径来申报、评审和评估博士生的培养和科学研究？

如果二级学科是教师们日常工作的平台和活动的范围，为什么不把二级学科作为建设的基本单位，反而去打造一个高高在上的一级学科平台。平台越是远离教师们工作熟悉的范围和层次，教师们就越难以参与，难以拥有发言权，参与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自然也会随之减弱。

当然，高校从宏观层面对一级学科发展进行部署也是必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学科制度是一套行政制度，从学科目录的制定和颁布，到学科资源的配置，都是在行政管理的框架下进行的，政策、资源、条件都是跟随学科建设走的。一级学科管理在实践中往往会忽视二级学科层面的知识活动需求。或许我们实施一级学科管理是为了促进二级学科的发展，但在实践中，被做大做强的一级学科未必能促进二级学科之间的合作，未必能激励教师进行跨学科研究，未必能培养出知识面宽广的学生。我们对学科的管理能否更加贴近教师学术工作的层面，更加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同时给他们更多参与的机会和可能？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大学的学科管理如何能更好地激发大学教师教学和科研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实际上，知识的发展和需求是多样的，而且是多变的，二级学科更容易与此对接，容易对此作出反应。

总之，无论从知识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教师工作的角度看，二级学科都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管理平台，我们的学科制度应该尊重这一基本事实。为了保持连续性，不妨一方面坚持目前的学科管理制度，同时也允许和鼓励二级学科管理的做法，比如允许以二级学科申报博士点，一级和二级学科管理并行，以满足学科建设的不同需求。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要充分尊重二级学科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